

2019年第2期(总第2期)

# 国际战略与安全研究动态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ND STRATEGY STUDIES  
REVIEW

俄智库对国际安全形势走向的预测  
国际战略安全研究领域新论点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ND STRATEGY  
TSINGHUA UNIVERSITY



## 一、俄国际事务委员会预测国际安全形势走向

2018年12月30日，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Russian International Affairs Council，成立于2011年7月，由俄政府打造，政、产、学、研、媒共同运作的智库交流合作平台，前外长伊万诺夫任主席)发布《2019-2024全球预测报告》。

报告认为，2025年前的国际秩序发展轨迹主要由五大因素决定：一是美国国内政治形势及其对外交政策导向。二是中美关系及两国维护自身基本利益和原则立场的政策取向。三是俄美关系以及俄与整个西方世界的关系。其中，政治较量是否会演化为军事冲突是个关键变量。四是现有国际“联盟”走势，特别是北约的稳定性和中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这样的“新型国际联盟”的发展。五是欧盟、印度、日本等其他主要力量有国内和外交政策自主性，也即“战略自治”能力。

报告指出，国际社会是具有多样性的，很难将所有元素都纳入大国权力辐射的范围之内，而且就大国关系本身而言也还存在很多独立变量。危机和挑战往往促成建立新的国际规则。当今世界不仅常受制于局部地区的微小麻烦，而且随着每一场新的地区危机的发生，大国关系、国际安全的脆弱性也在增加。

报告预测，从现在起到2025年，国际局势或将呈现以下四种发展前景，人类面临艰难的选择。

**第一种可能，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格式化重启”。**美国将在经济上继续保持超级大国地位，其全球战略重新回到“强硬实用主义”，即巩固与盟国关系，颠覆经济领域对美不利的国际机制和他国政权，

淡化“全球领导责任”，强调国家利己主义。推动美国政策调整的主因是其国内政治的发展变化：反对派试图在2020年总统选举前把特朗普逼下台，降低其实现连任的可能性。在权力更迭过程中，美国的精英阶层至少在概念上会重新审视特朗普政策对美国政治生态和对外战略的影响。如果特朗普在2020年败选，或者反对派在选前就将其政治遗产“销毁”殆尽，跨大西洋伙伴关系会重新加强，美国与亚洲盟友的防务联系也将得到进一步巩固，美国与亚洲和欧洲国家商谈多边性质自由贸易区的项目也会恢复。美国或许将谨慎对待与中国的关系，试图与北京达成暂时妥协，以摆脱“双重遏制”局面，专注于与俄罗斯的政治对抗。美国也会有选择地加强对伊朗的压力，努力恢复在中东的影响力，同时进一步加强对乌克兰的支持。

自由主义秩序的“格式化重启”至少能让西方感觉有能力迫使俄罗斯“投降”，对俄十分不利。俄将更加被孤立，国际影响力进一步下降，并且必须面对两难选择：要么回到消极防守状态，并承担由此带来的所有后果；要么在得不到任何保证的情况下向西方妥协，承担巨大政治风险，与西方的关系从相互让步变成“单向投降”。

**第二种可能，新的多极化世界加速生成。**如果特朗普连任，美国继续奉行实用主义、孤立主义的政策，俄罗斯、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独立性不断提高，印度继续其传统的“自治”方针，欧盟因对美国单边主义倾向的不满而不断提高自主性，那么国际社会恢复特朗普执政前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努力将宣告失败，新的多极世界图景将得以加速构建，人们将看到这样的具体发展：北约在欧盟自主性上升的情况下仍推行对俄遏制政策；由于乌克兰政府的腐败和无能，乌克兰问题持续发酵；建立以美国为中心的区域经贸制度难度加大，各经济体更多倚重以自我为中心的区域合作安排；中国实力持续增强，对与俄结成更紧密政治、军事联盟的态度更加谨慎，中美保持可控状态下

的竞争关系；伊朗逐渐适应美国的制裁，俄在中东的作用更加积极，中国的影响力也有所提高。

尽管特朗普在国内遭到反对派前所未有的攻击，但支持者的基本盘未变，总统地位仍相当稳固。需要关注的是，美国总统在对外政策方面的执政理念出现重大转变：从侧重多边重新转为倚靠单边或双边手段。准确地说，特朗普政府正努力将美国的全球治理从多边模式调整到双边模式，在军备控制领域则正转向单边主义。这样做的目的是压缩美国在国际合作中必须作出让步的空间，最大限度保全美国的传统安全利益。美国退出伊朗核协议和《中导条约》是国际安全领域具有核心性意义的重大事件，是“核武器受控对抗”时代走向终结的标志，反映了美国对未来几十年继续掌控全球战略主导权的期待。伊朗核协议本是认知进步的产物，它表明各方意识到政权更迭不是唯一、更非有效的解决问题手段，但现在这种共同认知正在瓦解。退出《中导条约》不是特朗普的个人立场，1960年代以来美国一直想要终结国际军备控制体系，小布什总统在21世纪初就曾宣称美国要退出《中导条约》，现在时机成熟了。即使特朗普不能连任，新一届美国政府也不会让国际军控体系重回原有轨道。美国退出《中导条约》的下一步是退出《削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这意味着制约全球战略安全形势恶化的重心将从战略稳定转向战术稳定。在此情况下，即便美与俄及其它关键战略安全方能达成某种双多边协议，其影响也将是短暂、有限的。

新的多极化世界格局当然对俄罗斯更为有利。俄将得以拥有更大的外交空间来应对美国和西方的孤立与遏制攻势，也更有能力实现自身对外资产的资本化目标。但即便是在迈向新的多极化征程的路途中，国际安全争斗的残酷性也不会有丝毫减弱。在这样一个过渡时期，各国都竭力维护本国利益，将国内发展置于国际合作需求之上，全球治理被淡化，没人能主动包容别人的错误，而且随着各国国内问题的积

累、利己主义的驱动，其所付出的代价会越来越大。

第三种可能，两极化趋势再现。中美矛盾加剧，美国视中国为首要竞争对手，持续对中国施加压力，试图遏制中国的科技发展进程，阻止中国取代美国在世界上的位置。随着“贸易战”的持续、相互制裁的升级，亚洲军备竞赛加速，中美之间的对抗正变得不可逆转，这会刺激已有的国际联盟加强合作，同时催生新的国际联盟。美国在印太地区巩固与盟友的合作，一方面加强对日本、韩国等国安保承诺，一方面与印度、越南建立“准联盟体系”。在美国的压力下，俄罗斯和中国的军事和政治合作逐步加强，中俄关系更加紧密。欧盟与美国存在战略相互依存关系，可能不再执意坚持自己在对俄、对华政策上的独立性。在俄罗斯的支持下，中国在中东、非洲和拉丁美洲将依托自己的发展模式采取更加进取的政策。

报告没有明确点出“两极”到底是中国、美国各为一极，还是中俄为一极、美国为另一极，但强调两极化趋势的再现有助于俄罗斯克服国际孤立状态，通过构建新形式、新范围的联盟加强自身安全，同时也可能使俄罗斯失去回旋余地，降格成为中国的“次要伙伴”，并在战略上过度依赖中国。

第四种可能，稳定的战略安全格局被打破，重要权力中心之间爆发冲突。2025年前如果出现国际冲突的局面，将是一系列看似孤立但相互又有某种关联的事件影响逐渐累积的结果。每一个事件都可能是偶发和局部的，但随着矛盾的不断加剧，会发生从量变到质变的转折，引发两个或多个大国之间发生冲突，对地区乃至全球稳定造成巨大冲击，并严重阻碍世界经济发展。可能触发这一局面的热点包括：俄美在叙利亚、黑海、波罗的海等地区摩擦的升级；爆发针对军事重地或关键基础设施的网络攻击，虚拟数字事件升级为现实军事冲突；

中美军事力量在南海发生正面冲突（与俄美冲突相比，南海问题更具可控性，但冲突升级的可能性仍不能排除）；某国对另一或另几国的大型军事演习产生误判，采取某种行动试图取得先发制人优势，导致冲突升级。军事演习演变成重大冲突的可能性虽然很小，但历史经验表明，大多数灾难都是在人们认为不太可能发生的时候突然爆发的。

特朗普奉行的“美国第一”以及由此在全球范围内助推的“私利至上”和排外主义倾向（Me First）正从根本上动摇二战后的国际秩序。20世纪下半叶，人类已经形成一种强烈信念：核武器十分恐怖，具有强大杀伤力，核安全必须是国际社会共担责任的领域，而且必须让主要对手共担责任的领域。今天，这一认知正在发生明显变化，美俄中等所有主要拥核大国都在研发新一代核武器。与上世纪80年代相比，人们对核战争的恐惧大为减弱，对核战爆发可能性的预判也在降低。各国正逐渐适应大国在全球战略稳定方面的“缺位”状态，对国际战略安全形势的变化变得心态麻木，也认为五个核大国在《核不扩散条约》范围内的承诺是虚幻的，这非常危险。多极世界何时才能到来？亦或只是一种幻想？

在可预见的未来，继续推行多边主义政策，拓展对外政策空间，利用外交手段协助解决国内发展面临的挑战，是俄罗斯外交的当务之急。今后几年，制定新的全球战略安全原则将成为一项重大挑战，主要责任仍落在莫斯科和华盛顿身上。国际安全格局与战略稳定考验着俄美战略家的博弈与理性。鉴于俄美关系的恶劣态势，很难想象两国领导人能在全球战略利益与共同安全视野下开展建设性的对话。关键问题在于，为什么普京和特朗普不时恭维对方，俄美关系仍然持续恶化？特朗普之后的美国会是副什么样子？普京到底想从美国那里得到什么，他推行的激进主义外交政策的目标是什么，能否实现？所有的国际安全利益攸关方也必须面对一个问题：如何在维护国家尊严和主权、坚持自己的地缘政治路线的同时，与不愿接受他国此类行为的美

国建立建设性的关系？并且，这可能吗？对于这些问题，目前没有人能给出准确答案，但它们将在很大程度上共同决定今后国际体系行为者之间的关系、它们在不断变化世界里发挥的作用，以及世界和平的命运。

（天津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朝鲜半岛研究中心副教授刘涛供稿，原报告下载网址：

[http://russiancouncil.ru/activity/digest/longreads/globalnyy-prognoz-rsmid-2019-2024/?sphrase\\_id=26205805](http://russiancouncil.ru/activity/digest/longreads/globalnyy-prognoz-rsmid-2019-2024/?sphrase_id=26205805)）

## 二、国际战略安全研究领域新论点

1、美国一旦与中俄爆发不使用核武的冲突落败机率大。兰德公司模拟战争结果显示，虽然拥有庞大武器库，美军仍存在诸多薄弱环节，如对大型基地设施和大型舰船的依赖程度高，很容易受到中俄远程导弹攻击，这使得依赖基地和舰船起飞的战斗机难以发挥其作用。中国重点关注网络空间的“系统破坏战”，其对象包括美国的通信卫星、指挥控制系统和无线网络等。这些连通各方的系统即使没有被完全破坏，也会受到抑制，中国人将“不屈不挠地攻击美国各级作战网络，他们一直在进行这种演练”。由于中俄在军事技术和武器质量上已经迎头赶上，美军需购置远程攻击导弹、部署机动短程防空系统、巩固其指挥和控制网络，改造这些薄弱环节需花费 240 亿美元。

——戴维·奥克马内克（兰德公司军事分析师）在新美国安全中心研讨会上的发言，<https://www.cnas.org/events/panel-discussion-a-new-american-way-of-war>

2、《中导条约》终止或导致新的核态势。《中导条约》的废除对中国、印度、朝鲜、巴基斯坦这四个有核国是一个信号，即军备控



制和裁军不再是重要的全球准则。如果俄罗斯和美国继续破坏这一准则，这四个国家在发展核武器以及弹道导弹计划方面可能会受到更少限制。亚洲出现另一个有核国家的可能性仍然很低。无核国仍强烈支持维护《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美国可能会要求日本、台湾地区以及其他亚洲盟友在领土上部署美国的陆基中程导弹。若未来该地区发生军事冲突，各方都不确定来袭的导弹是否携带核弹头，这种不确定性将增加局势迅速升级的风险，这也是要努力说服中国参加国际谈判的重要原因。未来，新条约应以军备控制为基础构建新的战略安全框架，取代以军备竞赛为基础的旧框架。

——格雷戈里·库拉茨基（忧思科学家联盟中国项目负责人）3月1日接受采访，<https://thediplomat.com/2019/03/us-withdrawal-from-inf-treaty-impact-on-asia/>

3、挑战美国地区主导秩序的国家正在结成联盟。俄罗斯和中国在能源、军工及重大地区问题等方面开展合作。在叙利亚，伊朗和莫斯科已在一定程度上达成协作。如果将这些挑战联系在一起，则是对美国主导秩序的反对，并有采取暴力、胁迫、恐吓手段的倾向。这些挑战将加速“后冷战”时期的地缘政治巨变。敌对大国有可能推翻支撑美国主导秩序的有利地区平衡，试图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将美国及其长期倡导的自由价值排除在外。大国对抗可能导致大国战争。随着中国实力的持续增强，如果其成功主导西太平洋，肯定会谋求更为宏大的布局。如果俄重新巩固对前苏联势力范围的控制，它可能会继续对前华沙条约组织的成员国施压。不满现状的大国如倡导“地缘政治修正主义”，常预示着日益加剧的国际冲突。

——哈尔·布兰兹（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国际问题高级研究院教授）、查尔斯·埃德尔（悉尼大学美国问题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3月6日文章，《大国和平的终结》，<https://nationalinterest>.

org/feature/end-great-power-peace-46282

4、美国不应发起对华新冷战。美国对中国存在重大误解。从智库到国会依然认为，美国只要在数十年来一贯的亚洲战略基础上再多做一点，就能化解来自中国的挑战。然而事实是，新冷战可能会像旧冷战一样艰难、危险、代价高昂。美国需要认识到，中国决心在东亚取代美国，不会容忍美国继续主宰亚洲。中国当前存在的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并不会阻碍其崛起。中国已经成长为一个非常可怕对手。抛给美国的终极问题是：是否坚决要遏制中国的挑战并保持本国在亚洲的领导地位，以至愿为此打一场大规模战争——很可能是核战争？如果美国不愿这样做，或者美国不能让中国相信它愿意这样做，那么它就无法赢得新冷战。如果美国无法获胜，那最好不要开始它。

——休·怀特（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荣誉退休战略研究教授）3月6日接受采访，<https://www.scmp.com/comment/insight-opinion/united-states/article/2188648/can-us-win-new-cold-war-china-not-without>

5、中美需就网络安全达成一致。如不能就“合法的网络安全政策”定义达成共识，华盛顿和北京还将各自采取单边行动，可能会以临时措施降低潜在风险，代价却是合作机会受损、技术进步受阻。与美国一样，中国也担心网络安全问题，两国有机会进行合作，以确保网络安全政策得到客观、正当、安全的使用，而不是成为保护主义的借口。网络管理的失序才是国家安全和基础设施真正威胁，而不是具体的信息通信技术产品。各国政府应当帮助构建一个基于最佳商业实践的框架，将所有信息通信技术产品纳入客观有效的网络安全评估体系。

——丹尼尔·伊肯森（美国卡托研究所贸易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朱欢（助理研究员）3月1日文章，《一份持久的中美贸易协定需就网络安全问题达成协议》，<https://www.cato.org/publications/>

commentary/durable-us-china-trade-accord-requires-agreement-cybersecurity

6、“逐步解除”制裁的方案可促朝保持弃核动力。制裁的解除应是临时性的，并分阶段持续至朝鲜完成无核化，防止朝鲜满足于某一阶段的状态导致无核化进程受阻，并可使美国在进程中始终保持影响力。解除制裁应逐级从较低价值出口产品到较高价值出口产品进行，使朝在看到切实好处的同时有继续进行无核化的强烈动机。在解除制裁的初期阶段，可适当允许朝增加采购被禁止进口的商品，如精炼油等。在帮助朝提振经济的同时，控制朝能获取的硬通货数量。制裁措施的选择也应从相对单一的商品或行业开始，暂缓涉及相互关联的复杂制裁。解除制裁还需有具体标准和时间表。朝鲜想要融入国际社会，首先需要先开始在现有国际规范内活动，展现出履行国际义务的诚意，开城工业园或可成为一个示例。

——特洛伊·斯坦加龙(美国韩国经济研究所国会事务和贸易问题高级主管)2月27日文章,《解除对朝制裁应逐步展开》,<https://foreignpolicy.com/2019/02/27/sanctions-relief-for-pyongyang-should-start-small/>

7、塔利班是阿富汗和平协议计划的最大受益人。与当初小布什决定出兵阿富汗一样，特朗普的撤军决定同样仓促。国务卿蓬佩奥只给了特使六个月时间来达成和平协议。这种“仓促”的根源是特朗普希望在总统选举前不计代价地实现和平。出于这一原因，俄罗斯和伊朗主动邀请塔利班进行商谈。该地区其他国家也在尝试与塔利班组织对话，以期获得发言权。因此塔利班是和平协议计划的最大受益方，虽然阿富汗的未来仍高度不确定。对塔利班来说，“伊斯兰国”组织

现在是一个大威胁，为此他们对美国的要求做出了让步，与“伊斯兰国”恐怖组织进行斗争。

——法国国际关系与战略研究所3月1日发表对库尔德问题专家卡里姆·帕克扎德的访谈，<http://www.iris-france.org/131781-en-afghanistan-les-talibans-sont-les-grands-beneficiaires-du-projet-daccord-de-paix/>

8、印巴“核天花板”下存在冲突空间。许多人担心印度针对巴基斯坦的行动可能招致巴方作出核反应。实际上，这种可能性很低。核战争理论家称，相互对抗的核国家存在一种“稳定/不稳定悖论”，即较低程度的暴力冲突相对安全，因为双方都认为迈上“核台阶”过于危险。但常规冲突的空间究竟有多大，则取决于冲突双方。过去几年巴基斯坦实际上是在利用核威慑阻止印度强力报复。印度本质上是安于现状的强国，其首要目标通常是保持现状。然而目前的局势反映出，“稳定/不稳定悖论”也在对巴基斯坦发生作用。在近几年的双方冲突中，印度屡屡利用打击行动吹嘘针对巴的“重大胜利”，反而是巴时常极力否认冲突。

——戴维·布鲁斯特（澳大利亚印度研究所荣誉研究员），《印巴：喜马拉雅地区的舞影》，<http://www.iris-france.org/131781-en-afghanistan-les-talibans-sont-les-grands-beneficiaires-du-projet-daccord-de-paix/>

本期责编：安刚、刘涛

支持单位：参考消息报社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

办公地点：清华大学明斋 217

联系电话：010-62771388

电子邮箱：ciss\_thu@163.com